



微信公众号

微博

今日头条

抖音

本期编辑:刘诗萌 美编:张瑜 校对:胡建宏

李固家族 何人葬故里

刘乐

东汉太尉李固自祖父李颀到父亲李郃祖孙三代人的县籍都是南郑,《华阳国志》《后汉书》记载甚明,唯其故里失传不详。幸有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“以水证地,以地存史”的记述,给我们提供了寻找的线索,注文云:“汉水又东,得长柳渡。长柳,村名也。汉太尉李固墓铭尚存,文字剥落,不可复识”。这段文字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:李固死后就葬在南郑县境内,一处濒临汉江叫长柳村的地方。按照古人落叶归根的传统丧葬习俗,归葬之地就是其故里。因此,汉中文史专家陈显远先生在《李固墓》一文中肯定地讲:“这里(长柳村)就是李固的故里。”

长柳村位于南郑县治(今铺镇)东三十里处,今属城固县柳林镇。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在《水经注疏》中考辨说:“《九域志》,南郑有长柳镇。今有柳村堡,在南郑县东南三十里,与城固县接壤。”表明长柳村,到宋代置长柳镇,清代又称柳林堡的历史沿革。民国时期还改叫过柳林铺,今为柳林镇。

史载,先秦置南郑,城固县,南郑县为汉中郡治,治所在今汉中市汉台区东二里的铺镇;城固县,南朝刘宋改成固为城固,隶属汉中郡,治所在今城固县东五里的清水西岸汉王城。由于李固故里长柳村介于南郑与城固两县毗邻处,地属何县,历史上区划屡有变动。经查证,长柳村划归南郑县的时期有:东汉、南北朝、清光绪时期、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。长柳村划归城固县的时期有:唐代、宋代、明代、清康熙、乾隆时期、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至今。

长柳村作为东汉名臣李固故里,倍受文士官吏爱屋及乌般地关注。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诗人王勃,来到这里,作《长柳》五言诗留下:“晚风清近壑,新月照澄湾。郊童樵唱返,津吏钓歌还”的优美诗句。北宋兴元府知府文同,到城固寻访前朝隐士崔颢遗迹,在“访问诸故老,寂无祠与坟”的遗憾中,拜谒李固墓。他十分敬仰“此县汉唐时,诸公扬清芬”的风范,故而“刻诗于坚庙,来者期不泯”,在李固祠庙刻诗传承,希望后来者知道先贤的事迹。

三国孙吴史学家谢承撰《后汉书》记载:“固临终,敕子孙:素棺,三寸幅巾,殓殓于本郡境垆之地,不得还墓室,有污先公兆域。”表明遭罹,李固骸骨没有葬入李氏家族墓地,而是安葬在了长柳村东边的“垆地之地”。墓家南北向,头北脚南,墓基长42米,宽23米,冢高6米,长14米,宽10米,呈覆斗形,这里正是一处荒凉瘠薄的高坎之地。

那么李氏家族墓地又在哪里呢?经考证其在李固墓西十里的七星台。据陕西省文物局编辑出版的《汉中卷·城固文物》一书介绍:“七星台汉墓群,位于城固县柳林镇草寺村六组,村委会南800米处。墓群所在地名为七星台,据当地老人讲,这一片共有圆丘形封土七处,分布似北斗七星,故名七星台。后遭到破坏,现存封土呈不规则长方形,长9.5米,宽5米,高1.7米;在封土堆发现带有花纹的汉砖。”民国以前流传“草寺有个七星台,李家先人这里埋”的传说。查西汉时期长柳村一带的宦官大族,只有显赫一方的李固家族。史载李固祖父李颀、父亲李郃、儿子李郃死后均葬故里。如李固四十二世后裔李道、南宋淳熙八年修撰的河南汤阴县《瓦岗村李姓族谱》记述:“溯忆我李肇迹陝西名族,自东汉始祖颀,二世祖郃,墓南郑。”嘉庆《汉中府·邱墓》载:“南郑县:汉司空李郃墓。京兆尹李燮墓。”七星台东汉李固家族墓地,所葬七人应为李颀、李郃、李历之父(李颀子、李郃弟、李固叔父),李固堂弟李历,李固三子:李燮、李基、李焜。

荡秋千,就是揪着皮绳而前后摇摆。其起源,可追溯到几十万年前上古时代。那时,我们的祖先为了谋生,需要上树采摘野果或猎取野兽。在攀援和奔跑中,他们往往抓住粗壮的蔓生植物,依靠藤条的摇曳摆动,上树或跨越沟涧,这是秋千最原始的雏形。至于后来绳索悬挂于木架、下挂踏板的秋千,春秋时期在我国北方就有了。当时拴秋千的绳索为结实起见,通常多以兽皮制成,故“秋千”两字的繁写均以“革”字为偏旁。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。

《古今艺术图》说:“此(荡秋千)北方山戎之戏,以习轻(敏捷)者”(见清翟灏《通俗编》卷三)。山戎是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,属地在今天的北京市及其周围地区,秋千原是其进行军事训练的工具。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带兵打败山戎后,将其国土划归燕国,秋千也随之向南流传,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华大地上很多民族共同的游艺竞技项目。

古代荡秋千是在清明、寒食节前后才有所见,而且仅仅局限于豪门贵族的红男绿女,于传统节日的狂欢游戏之用。《艺术类聚》中就有“北方山戎,寒食日用秋千为戏”的记载。汉武帝时宫中盛行荡秋千;唐人高无际《汉武帝后庭秋千赋》云:“秋千

者,千秋也。汉武祈千秋之寿,故后宫多秋千之乐。”荡秋千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。唐代宫廷把荡秋千称为“半仙戏”,五代王仁裕在其笔记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说:“天宝宫中,至寒食节,竞竖秋千,令宫嫔戏笑以为宴乐。帝呼为半仙之戏,都中市民因而呼之。”唐宋以后,随着城市经济的发达,市民阶层的大量涌现,荡秋千逐步演变成节日中的狂欢节目。杜甫有诗云:“十年蹴鞠将雏远,万里秋千习俗同。”写的是踢球、打秋千锻炼身体的习俗。刘禹锡亦有诗:“秋千争次第,牵拽彩绳斜。”可见荡秋千习俗流传之广之盛。老电影《芦花恋》中就有勤劳善良、淳朴勇敢的拉祜族青年男女荡秋千的画面,尤其是插曲《婚誓》的歌词非常唯美且具有画面感:“燕子双双飞上天,我和阿哥(妹)荡秋千。秋千荡在青空里,好像燕子云里穿。”

在宋代还出现了“水秋千”的杂技表演,上自皇帝妃子、王公大臣,下至庶民百姓,竞相观看。表演之前,先在水中置两艘巨大画舫船头竖起高高的秋千架,表演时船上鼓声大作,船尾的杂耍艺人要练上竿后,依次序登上秋千,奋力悠来荡去。当秋千悠到和秋千架的横梁相平之时,他们双手脱绳,借秋千回荡之力跃入空中,在空中翻个跟斗,然后投身入水。因表演者姿势

各异,看上去惊险优美而又变化无穷。“水秋千”类似现代跳水运动,是宋代杂技的新发展,在中国杂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,对后世颇有影响。

荡秋千不仅仅是我国古代清明节的一种习俗,更具有医治疾病的作用,据说还可以“释闷闷”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二十五回开头写吴月娘、孟玉楼、潘金莲、李瓶儿等在花园里荡秋千的场面,并引用了据说是出自唐伯虎之手的《秋千诗》。诗云:“二女娇娥美少年,绿杨影里戏秋千。两双玉腕犹反复,四只金莲颠倒颠。红粉面对红粉面,玉酥肩共玉酥肩。游春公子遥鞭指,一对飞下九重天。”李清照亦填有一首《点绛唇·蹴罢秋千》。一时间,荡秋千几乎成了女性的专利。

在关中农村,荡秋千被称为“打秋”。旧时,每逢清明节前夕,村里的青壮年秋千爱好者,按惯例在族长或村干部的支持下,在开阔乡场或街道上搭建起打秋千的木架,将四根粗圆松木檀两两交叉栽埋于路两旁地下,再在上面交叉处横梁一木架,再将一根结实的绳索在横梁上缠绕垂下,距地面半尺左右,再穿一套环上的牛扼头或板凳面子作踏板,绳头另一端也绑缚在上梁上,缚好后后的“秋千”暂时加锁待用。清明当日才能开锁表演。表演时人们里三层

外三层,像看戏一样热闹。只见表演“打秋”者双手抓绳,一脚踏板,一脚着地,向前猛跑几步,快速将脚收齐并拢,借着惯性与动力,或收绳蹬,或扩绳坠,三五下便荡得与横梁持平,甚是惊险。看得观众目瞪口呆,掌声不断。这个人表演完毕,那个人接着上,相互一决技艺高低。

打秋的运动方式不仅可以一人独荡,而且可以两人(可两男两女或一男一女)面对面互荡,情趣颇浓。其中有一种玩法是:一个人坐在帆板上,另一个人脚踩两边,靠着推送之惯性来回晃荡。另一种玩法是:让年老体弱者坐在踏板上,靠人工快步推送至半空松手,靠着惯性来回游荡升降。最刺激的是坐在踏板上,别人双脚蹬坠至最高处,然后自然下落的感觉。只觉得疾风呼呼从耳边穿过,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不少胆小的人,脸色发白、尖叫不止。农村人把这叫惊险的“滋润”,说是可以疏通经络,还是较为妥帖的。

清明节的打秋活动,过去在关中农村一般不超过一周。三四天后,秋千架便拆除了,刚上瘾的娃娃们便盼着来年。个别孩子,意犹未尽,回家缠着大人在门框或在两棵树上用绳绑个小秋千,邀上玩伴你推我送,交臂晃悠,继续玩耍,只是缺少或根本就没有村里大秋千的奔放与刺激。

明清咸阳城的钟楼

胜迹

刘晓东

每年的租金作为疏通水道及将来修葺钟楼的资金。据清乾隆十六年《咸阳县志》续志及民国二十一年《咸阳县志》收录的清道光年间咸阳县知县陈尧书“重修咸阳钟楼碑记”记载,自乾隆七年(1742)重修钟楼后,“越今(道光十三年)又九十余稔(年)。岁久材朽,上则破瓦断椽,巍巍欲坠;下则轨迹积潦,颠覆为虞。靡特观瞻弗壮,亦行旅戒心也”。道光八年(戊子,1828),知县陈尧书履任后,就开始谋划重修钟楼,只因当时才商议要重修城垣,导致经费紧张,无暇顾及重修钟楼,到了道光十三年(癸巳,1833)秋九月,重修城垣工程完工后,陈尧书偕同僚召集县邑绅士耆老商议重修钟楼之事,陈尧书带头捐献俸银百两,众多绅商踊跃捐助了重修工程所需的其余银两。“工(重修钟楼工程)兴于乾隆七年冬十一月,落成于次年(乾隆八年)秋九月”。重修后的钟楼“自巔及基,焕然一新。”“下分为四门,向作方形”。姚世道还对钟楼下的泥道用废碾数十枚进行了修整,道路才得以平坦,不会积水。姚世道还在钟楼西北的空地,修建了四间房屋,并推举诚信严谨之人来管理,房屋

载乾隆、道光年间重修咸阳钟楼的《重修钟楼碑》及《重修咸阳钟楼碑》均已不复存在,所幸清乾隆十六年《咸阳县志》收录了乾隆八年“重修钟楼碑记”,清乾隆十六年《咸阳县志》续志及民国二十一年《咸阳县志》收录了道光年间的“重修咸阳钟楼碑记”,两篇碑记弥足珍贵,为研究明清时期的咸阳钟楼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民国二十一年《咸阳县志》记咸阳钟楼用途“望氛视察灾祥。上悬大钟,按时撞之”,咸阳钟楼定点报时,声震数里,钟鸣祥瑞。张德臣编《渭城文物志》记载,咸阳钟楼上大钟高约2米,上铸楷书铭文“秦始皇帝制”,1952年拆楼时将钟移至凤凰台。明清时期各地的钟鼓楼主要作报时、报警之用。大多设置在城市的中心,大城市钟楼、鼓楼分置,东钟楼西鼓楼对峙排列,咸阳这样的小县城则只有钟楼,未见鼓楼,有的小城市只设鼓楼,未见钟楼。明清时期各地城市都实行宵禁制度,早上钟楼敲钟,城门开启,万户活动。晚上鼓

楼击鼓,城门关闭,宵禁人息。这就是所谓的“晨钟暮鼓”。按照姚世道《重修钟楼碑记》中“(钟楼)盖以警昏昏”的记载,咸阳钟楼早、晚都要负责报时,这就兼具了鼓楼的功能。钟楼对当时人们的起居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明清咸阳钟楼的建筑概况,除两篇碑记的记载外,民国二十一年《咸阳县志》记“楼(钟楼)三层,高五六丈”,清光绪三十三年(1907),法国人沙畹参观游览时拍摄的咸阳钟楼照片,为最直观真实的清代咸阳钟楼资料。根据文献资料记载,特别是1907年拍摄的钟楼照片来看,明清咸阳钟楼为楼阁式,砖木结构。楼分为三层,基座为券洞式砖砌土墩,基座以上为两层重檐。门洞地面铺青石。2010年新建成的咸阳钟楼,基本参照了清光绪三十三年咸阳钟楼的建筑形式。钟楼为明清咸阳城最高建筑之一,登楼远眺,山水映入眼帘,历历可数,美不胜收。是明清咸阳城的一大景观。

情尽义全话周仁

人物

郭发红

将《周仁回府》演出3000余场的李爱琴老师和华阴籍的尹贻成老师,他们都是秦腔大师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还有梅花奖获得者李小锋、谭建勋等,他们今天仍活跃在舞台上,都是“活周仁”。年轻一代的“活周仁”当推80后的杨升娟,她是李爱琴老师的关门弟子,并依凭改编的秦腔传统剧目《周仁》,喜摘中国戏剧梅花奖。相形之下,新版《周仁》将有关的过场戏和配角戏简化了,如杜文学“托妻”、奉承东“献社”、严奉二贼合谋“陷周”和杜文学流放“起解”的戏,这该是受限于申报梅花奖规定的两小时原因吧,对此观众尚能接受。但让大家揪心又纠结的,恰如改编前后的戏名之差:只有“周仁”,没了“回府”,看到戏来,果然是周仁没有回府,他要给妻子李兰英守墓。

这让执着的观众如何是好。周仁这一悲苦又高大的形象早已扎根在他们的心中。人们敬佩周仁夫妇的知恩图报和侠肝义胆,为“李代桃僵”的剧情安排而痛心不已,更为周仁委曲求全、仁至义尽的行为而热泪滚滚。人们更期望周仁能够回府。此“回府”不是剧中的“回府”,回到他夫妻和妻子临时居住的太宁驿,也不是回到杜公子的府上,而是回到自己的官府,至少是官复原职吧。如此有情有义的人当官,他肯定会造福于民的。

周仁不回府,亦在情理之中。原因大致有三:

其一,陪伴亡灵,与妻诉说。之前以桃代李,周仁保护嫂嫂逃亡,即便在“冷凄凄的荒郊外”,也只能悄悄地“哭妻几声”。在面对老仆人的怒骂杖责,也不敢明辨,深恐人心难测。终于盼得哥哥回来,却是一顿饱打(新版是兵卒鞭打,原版是杜文学棍打),这多日的挣扎和无奈、煎熬和不堪、郁闷和委屈一股脑儿地都要向妻说出来,这正是:“愿已偿债已还无有遗憾,问贤妻今夜魂归哪边。生不能常恩爱百年相伴,九泉下与贤妻共话团圆。”

其二,厌恶官场,不想自陷泥潭。周仁当年押运银两,浪里翻船,竟被人构陷,差点丢了性命,后来受杜家庇护,也是好景不长,险象环生。“叹人间多荆棘途途艰险”,想我妻“孤寂寂寞荒丘隐恨长眠”,故不回府者安。

其三,即便回了府,又能如何?周仁夫妻相濡以沫,如今阴阳两隔,再让他每天见到杜公子夫妻,不免悲从心来,所以还是遁匿的好,“李兰英侠义人神共鉴”,有此心灵栖息之所,夫复何求!

笔者认为,周仁当回府,如此才得圆满。这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美好愿望,主因还是儒家所倡导的社会担当。为什么他就叫“周仁”呢?周,周朝、周公之“周”。周



任哲中《周仁回府》剧照。

朝奠基中华文明,周公制礼作乐,以德治国。周人谐音周仁,仁者爱人,“仁”恰是儒家的思想精髓,它与周公创立的礼乐文明和德治思想一脉相承。孔子说:“志士仁人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。”曾子说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可见,仁者本有牺牲精神,还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去。

鲁迅曾说:“我们自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我们期待这样的新周仁越来越多。